

新中国初期重庆社会建设的历史考察

扶小兰¹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人民开展根除社会遗留问题的“废旧”运动，净化了社会环境，重建了社会秩序；实施发展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新生活的“立新”举措，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成功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提供了有利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进而推动新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进程。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 (2013) 11-051-04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此时期重庆的社会建设无疑是全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管中可窥豹，因此，本文拟以此时期重庆社会建设实践为考察对象，力求揭示和探寻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轨迹、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

一、根除社会遗留问题，重建社会秩序

重庆历来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解放前夕又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重庆，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经济破败，烟赌娼等社会遗留问题突出，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风气污浊，社会生活萧瑟。为“建设人民的新的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在筹划和领导西南全区和重庆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等伟大建设工程中，对烟赌娼等社会遗留问题的治理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开展了禁绝烟毒、清除赌博、取缔娼妓、收容游民乞丐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荡污涤垢、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运动，使久染烟毒、长醉赌博、沉沦娼妓、流落街头的大批民众获得了新生，逐渐养成劳动的观念和能力，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从思想上认清和铲除了烟赌娼这个“三毒一体”贻害无穷的毒瘤，逐步树立起正确的心理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步入正常人的生活轨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用之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也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一次思想和精神的洗礼，促使重庆人民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扭转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稳定了社会治安，重建了社会秩序，促使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尘埃荡尽之后”走向新生，迎来崭新的发展起点。

二、稳定和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而实现这一首要任务的根本基础无疑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一指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像重庆这类大城市在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重庆解放之初，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颓败，工厂倒闭，商业萧条，金融紊乱，银根紧张，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为恢复国民经济、稳定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人民开始了艰苦的恢复重建重庆经济的工作。通过整顿财政金融，平抑物价，稳定市场，调整工商业，巩固财税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¹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12XDJ016）

作者简介：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重庆，400041

恢复经济，稳定人民正常生活的首要任务是整顿财政金融，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邓小平在重庆市接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①解放初期，重庆市场上银圆、银圆券、人民币混合流通，经济秩序极度混乱。1949年12月10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了金字第一号布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之惟一合法货币”，“伪银元券及其辅币券自即日起宣布作废，禁止流通”。布告宣布按1：100的比价，限期以人民币收兑散在民间的银元券，以1：6000的比价收兑银圆。5天内收兑银圆券1012万元，兑出人民币10.13亿余元（旧人民币）。^②1950年3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施统一收支、统一贸易、统一现金管理等各项制度，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货币、财政的统一，为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为保证市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市政府在统一货币与财政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市场供应，稳定物价。1950年3月后，重庆市先后成立国营贸易公司、零售公司、城乡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商业机构。国营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吞吐物资，占领批发阵地，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煤等由国营零售公司组织销售，或者通过合作社直接分配到市民手中；对私营商业者采取团结、扶助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恢复正当营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促进城乡商品流通，组织货源，扩散地方产品；对批发价、零售价、地区差价作出明确规定。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稳定了物价，迅速结束了解放前几年物价成数千倍上涨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1950年与1949年相比，全市物价仅上涨1.7倍；1950年2月，以1949年12月价格为基期的重庆42种主要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448.08，12月降为117.43；以1950年为100的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1951年为111.8，1952年降至108.7，1953年降至106.4。“一五”计划时期，重庆市场零售物价基本稳定，以1952年为100，1953年为97.9，1955年为100.0，1956年为103.2。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1952年为106.1，1954年为104.9，1956年为109.0。^③长期相对稳定的物价，无疑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在市委、市政府采取的稳定经济、恢复生产的多种强力措施下，1950—1952年重庆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发展，“一五”期间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1952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11亿元，比1949年增长58.9%，年均增长16.7%。^④到1957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12.7%，年均递增16%。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市场的日渐稳定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1956年，重庆市场进一步繁荣，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接近完成1957年的计划目标，比1952年增长47%。1957年，重庆市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销两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5亿元，比1956年增长30%。到1956年，全市累计安排就业人数达14万多人，仅1954年由市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的人数就达4万人。并对少数生活有困难的市民实行了救济制度、补助制度，仅1956年就发放救济金100多万元。职工工资收入不断增加。1954年与1950年相比，冶金部门工人工资增长105%，加工工业部门工人工资增长124%，纺织工业部门工人工资增长38%。1956年，全市职工（包括手工业者）人均收入均比1952年增长37%。市民收入的增加增强了社会购买力，1954年，全市民购买力比1950年增加56%。市民人均居住条件也有一定的改善，全市人均住房面积由1952年不足2平方米提高到1957年的3平方米。^⑤

三、丰富和提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精神文化生活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反映和提升，是衡量人民生活富裕与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而解放前重庆公共娱乐场所太少，百万居民仅有一个中央公园，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倾注了大量心血，从“王园”、“渝舍”到枇杷山公园、少年宫的开辟，大田湾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从文艺工作的改造、文艺活动的开展到“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为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

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是保障和提升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载体，亦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坐镇重庆的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对重庆市委、市政府进驻环境清幽舒适、设施齐备且占地广大的前国民党要员的私人公馆——王陵基的“王园”和杨森的“渝舍”办公的行为给予批评，认为应将这两处园林开辟为供人民休憩娱乐的公园。他指出：王园、渝舍这类地方开辟出来，作为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的场所，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并批评市里领导说：“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群众文化生活，缺乏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我们当市长、市委书记的，要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正是在邓小平的坚决督促下，重庆市委、市政府积极设法另觅新址办公，最终将这两处地方开辟为枇杷

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正因此，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给予极大关注和大量投入，使一批文化设施相继落成。1951年4月底，开工仅半年的大田湾广场即告落成，成为当时重庆和西南地区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重庆解放后首项城市标志性建筑。1952年8月5日，由邓小平亲自题写名称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落成开幕，成为重庆市最大的职工文体活动中心。而“西南军政委员会大礼堂”（今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修建，更是当时重庆市政建设的经典之作。该大礼堂于1954年3月竣工后，即成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行政委员会以及重庆市诸多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且以其恢宏气势、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享誉中外建筑史册。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发展为丰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了基本条件，也使重庆城市面貌和基础设施大为改观，初步奠定了重庆现代城市文化娱乐设施体系的基础。

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大众文体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重庆解放后，以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为指导，对旧有文化艺术进行改造，并筹组各行业协会组织。如在1950年内共组织654名旧艺人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有针对性地对其旧思想、旧意识进行改造，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整个文艺界的改革奠定基础；同时组织了重庆市文协、剧协、美协等筹备会，正式成立了重庆市音协和曲艺改进会，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开办“大众游艺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促使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和娱乐方式逐渐形成。尔后，又通过对文艺界的整风，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逐步认识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道理和意义。从而促使全市文艺工作在整顿和改造中得以发展。如电影事业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使看电影成为当时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和时尚追求，在逐渐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技术，培育社会新风尚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底，重庆电影院由1950年的8家增加到13家，座位数从8042个增加到11293个，观众人次从340.8万人增加到841.2万人，增幅分别达到40.4%和146.8%。^⑤戏曲艺术经过改革和调整也日渐繁荣，看戏、听戏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又一主要方式。到1952年底，重庆有川剧、京剧、越剧、汉剧（1953年初离渝）和杂技五个剧种；有13个剧团，包括京剧团、汉剧团、越剧团、杂技团和9个川剧团；有13家剧院（场），座位数和观众规模均有大幅增加，达到10486个和440.68万人次，分别为1950年的2倍和2.6倍。^⑥同时通过这些文艺机构，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并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据统计，到1954年上半年，全市电影院发展到19个，电影队由1队发展到37队，剧场由8个发展到15个，文化馆由1个馆发展到10个馆、2个站；另有图书馆4个，藏书1472404册。1953年全市电影观众达10167911人次，较1950年增加近2倍；戏剧观众5971936人次，较1950年增加3倍多；受到文化馆宣传教育的群众达3408645人次，借阅图书的群众为537846人次。^⑦另外，群众性体育对于普及群众体育运动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1952年5月4日至15日，西南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重庆大田湾广场举行。邓小平对它普及群众体育的作用非常重视，虽然他平时较少出席公众活动，这次却亲临大会检阅，并为之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正是这次运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西南、全重庆的群众体育乃至竞技体育的蓬勃开展。此后，以篮球为主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蔚然成风，打篮球或周末球赛成为人民群众新的娱乐方式。可见，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人民群众收入的逐步稳定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要途径，也反映出工作之余的文化娱乐活动正日渐成为人们新的生活追求。

四、倡导和培育社会新风尚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社会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的重大转变。^⑧解放后的重庆，随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各项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逐渐改善、思想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他们作为人的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因而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激动、兴奋，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成为人们的共同心理，平等、健康、文明、奋进的新风尚在全社会逐渐形成。

婚姻法的颁布，婚姻制度的改革，使深受封建压迫的妇女得以解放，享有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的权利，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促进了婚姻观念与习俗的更新。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新婚姻法以其鲜明的反封建主义特征，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男女青年的热烈拥护，其贯彻和执行使重庆人民迎来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促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重庆市自新婚姻法颁布之日起，即开始按照新的婚姻制度，试办婚姻登记，且于婚姻登记中，进行新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据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2月的9个月中，全市申请登记结婚的有2793对，离婚的有809对，复婚的有15对，其中以工人农民申请结婚的最多，工人占46%，农民占21%；申请结婚登记的是逐月上涨，从最初的100人左右上升到1951年元月的460人，增加了近5倍；离婚者中，意见不合者占54%，重婚者占16%。^⑧由此可见，旧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正受到冲击，新的婚姻制度正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那些向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年轻人以及那些深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妇女所接受和拥护。

为使婚姻法真正得以贯彻执行，妇女真正得到解放，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重庆市委于1950年10月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并于1951年1月成立了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指示》，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运动。据统计，在运动月中，全市共出动报告员602人，传授员259人，宣传队员28133人，举行专题报告会1459次，召开解释会6323次，全市受到婚姻法教育的群众多达1431300余人次。^⑨经过大规模、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为旧婚姻制度的崩溃、新婚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极大地推动了婚姻观念和习俗的变革。在婚姻形式方面主要表现为包办婚姻减少，自主自愿婚姻日趋增多；在婚姻礼仪中落后、迷信的内容被淘汰，婚宴仪式逐渐增多，茶话会、集体结婚、旅游结婚等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再者是离婚再嫁习俗大变，人们敢于通过离婚的方式解除不幸的婚姻。据统计，重庆市1953年1至11月登记结婚的多达19674对，比1952年同期的12038对增加了163.4%。其中，据对重点检查登记的199对结婚者的调查，完全自主自愿的达194对，占总数的97%以上。在同年1至9月办理的981对离婚登记中，强迫包办的有216对，重婚的152对，不堪虐待的34对，遗弃的2对，有生理缺陷和精神病者50对。^⑩藉此此举表明新的合理的婚姻制度正逐步取代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使几千年来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被打破，妇女第一次享有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劳动妇女逐步走出家庭，真正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

烟赌娼等社会恶习的根绝，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休闲娱乐生活的丰富，促使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渴求知识、学习文化成为人们新的生活追求，一种健康、文明、奋进的社会新风尚随之逐渐形成。根据新中国文化教育总方针，重庆市委、市政府确立了重庆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着力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事业，推进学校教育的恢复与改革，逐步建立起与生产相结合的、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型文化教育体系。同时，为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广泛开展群众的业余教育，主要采取创办夜校识字班、建立人民文化馆、组织工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和工厂文艺工作委员会等形式，开展“以工教工”、“以农教农”的读书运动，吸引工农群众参加学习；大力开展各工厂的文化教育活动，丰富广大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至1951年底，全市共成立正式的职工业余学校121所，参加学习的固定职工达5.08万人；各厂矿企业中，90%以上都成立了业余学校或业余学习班；农民和街道居民也建立了485所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人数达到19.68万人。^⑪藉此由此促使学知识、学文化的新风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不仅有利于工农大众文化知识水平与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五、推进市政建设与公用事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邓小平在1950年12月的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⑫藉此他把市政提到近代工业的高度，与工交相提并论，将其视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他对重庆这类大城市的市政建设的重视程度。为此，重庆市政府提出“为工业、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积极推进市政建设与城市公用事业的整治和建设，从而改变了市容市貌和人民生活环境，提升了市民生活质量。

人民政府的重视与资金的保障是推进市政建设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据统计，1950—1952三年间，重庆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2035万元，城市交通运输及邮电、城市公用和文教卫生及科学研究，分别为247万元、2021万元和1485万元，占全市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为2.05%、16.71%、12.33%。^⑬若将三者相加，则占全市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超过30%。“一五”期间，重庆的全部地方投资总额仅为7979万元，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费即达3163万元，占投资总额的39.64%，是地方工业建设投资（1191万元）的2.66倍，居各项事业投资首位。^⑭市委市政府对城市市政设施与公用、文教卫生事业建设在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

发展中所居地位重要程度的认识，以及对此的重视程度与努力由此可见一斑。正因此，重庆市政设施与公用事业建设等在解放初期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道路建设方面，1950—1952 年间共投资 689.96 亿元，占市政建设总投资的 53.5%；新建改建道路 22 条（段），总长度 49.44 公里，其中新建 21.94 公里。^⑦到 1953 年，全市共完成道路工程 80.78 公里、沟道工程 15.66 公里，从而初步改变了重庆道路交通十分不便的状况。这无疑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和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城市卫生建设方面，市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仅中央人民政府补助的市政建设款项即多达 2914451 万余元。在市政府与全市人民的艰辛努力下，1950 年共完成下水道工程 22 公里又 641 米，超过预定计划（20 公里）的 13.32%；新建公厕 32 座，小便处 15 个，垃圾站 17 个，并疏通部分重要沟渠，使城区的雨水和污水初步有了去处。并建立了街道清洁制度，配置专门的垃圾车，每月平均运出垃圾 2080 吨，从而减少垃圾乱堆乱倒现象；此外，还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清洁大扫除运动，使积存多年的垃圾得以清除，城市卫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人们逐步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⑧公用事业方面，人民政府每年均投入巨资以改善发展城市公用事业，使之逐渐满足人民的需要。经过前三年的努力，使解放前夕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公用事业如电力设施、自来水管、公共汽车、轮渡等设施设备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解放前市区共有路灯 1008 盏，但其中只有 831 盏可供照明，而且灯光极其灰暗微弱，路灯形同虚设，并且许多道路街巷无路灯。到 1952 年，路灯增至 7891 盏，市区照明有了很大改善。1949 年重庆自来水管仅 170 多公里，远远不能满足市民需要。尤其长江、嘉陵江沿江一带，由于没有铺设自来水管网，沿江约 2 万户、10 万人长年累月直接饮用污秽的江水，因而导致霍乱、伤寒、痢疾等疾病经常大面积流行。为逐步改善这种状况，市政府在原有 4 个水厂的基础上，新建水厂 1 家，新增自来水管 30 多公里，全市水管总长度达到 200 多公里，日产水量从 2 万吨增加到 3 万吨，自来水饮用人口从 1950 年的约 25 万人，增加到 1952 年的近 50 万人。公共汽车由 1949 年的 11 辆猛增到 1952 年的 168 辆；载客人次从每月 6.2 万增加 85.5 万，分别为 1949 年的 15 倍和 13.5 倍；公共汽车运营里程从 1950 年的 161 公里增加到 1952 年的 348 公里。同时，从 1952 年 7 月份起，市区全部改为苏式客车，使公交车的车况得到改善。轮运方面，1951 年恢复了渝李（家沱）、渝唐（家沱）两条航线，使全部航线达到 12 条。1952 年，航线增加至 15 条。两江轮渡，1949 年只有 6 艘，1952 年增加到 15 艘。^⑨而这些新增的公用设施大都着重于僻静小巷和居民聚居区，无疑极大地改善了市民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城市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旧布新”的社会建设实践，促使重庆社会风气好转，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尚逐渐形成，广大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和良好形象极大地提升，为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有利的社会氛围，从而培养了新的政治认同。为重庆乃至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提供了有利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进而推动了新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进程。

参考文献：

①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邓小平与大西南（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7 页。

②④⑤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重庆市志》（第三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19、27 页。

③重庆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重庆市物生活调查史料（1950—1988）》（内部资料），1989 年 12 月印行，第 1、2 页。

⑥⑦⑧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8、79、77、85、109、87 页。

⑩⑪⑫俞荣根、张凤琦主编：《当代重庆简史》，重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104、78、80、80、106—107 页。

⑨范小方、童学：《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9 页。

❏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重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49 页。